

口述歷史：從收看電視的習慣述說個人歷史 和方法論的反思

李嘉言

口述歷史：從收看電視的生活習慣述說個人歷史

呂先生今年八十一歲(1927年出生)，是筆者的法文老師。跟他學法文約兩年，在課堂中他有時會提到自己的經歷，因此對他有點認識，才知道他以前在中國大陸醫科畢業後便當上婦產科醫生。學生是以小組形式上課，有時我們會圍着打開老師從大陸帶來，用了幾十年的法文字典討論文法問題。有一次他又揭開那字典，見到紙章上他往日查閱時所留下的污蹟，便指着揭開的那頁，懷緬起過去說：「那天我一邊吃着飯，一邊讀著這個字的意思，讀得津津有味，不小心便把飯菜汁也滴到這頁上了。我常常揭開字典時，見到我留下的污蹟便會想起一些往事的。」

又有一次，他與我們分享他寫給外孫女的書信，把自己對人生的體驗精要地撮成薄薄一頁信紙的文字，我感到很有意思，亦為之觸動，並更加使筆者對老師的一生產生一點好奇，也因此希望透過是次口述歷史的過程：包括訪問，選取資料及書寫去再現(represent)老師極少部份的歷史。筆者相信這種說故事的方式可把記憶和傳統帶回現在而產生與現在有關的意義¹。書寫的歷史雖「小」，但筆者作為聽故事的人，相信是當中最大受益者。

¹ Benjamin, Walter (1968), *Illuminations*, The Storytell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P.83-110.

呂先生在 1979 年來港後，因醫生專業資格未在港被承認而轉教法文已差不多卅年了。他出生和大學畢業於上海，那時法國殖民統治上海租界，教會學校均以法文授課，就讀教會學校的他在中學和大學時期也因此以法文為主要學習語言。亦因為他的法語水平高，往往成為學生代表向學校以法語表達學生意見。呂老師曾長時間分別在曾受西方(包括法國)殖民統治的上海和曾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生活，而這兩地的主權也先後移交與共產黨新中國，但他的學習、工作以至日常生活都經常應用到法文。收看電視成為了很多香港市民生活習慣之一，老師是其中一位，平均每天看四小時電視。在這大眾受媒體操控的年代中，本港免費商業電視節目主要鼓吹消費娛樂的意識。大部份節目質數每況愈下，原本通過電視，以為世界各地的距離可拉近，開闊個人的視野，但在看電視幾乎等於娛樂下，卻限制了對外界資訊的接收。² 電視灌輸了相當的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的改變了個人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作為知識分子，又有收看電視習慣的市民而且是長者的呂先生是如何看待此情況？而通過收看電視如何理解現實世界？而節目內容又如何與長者的個人經歷拉上關係？在與呂老師的一次約兩小時的個人訪談後，我抽取本人以為重要和有關的部份，去再現(represent)呂老師部份口述個人歷史。

呂老師在內地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頭，這段過去的記憶雖深刻，但也不願多提。這經歷和在國內所受的殖民地西方教育和「共產黨」式(在訪談中他

² 王逢振編:《電視與權力》雷蒙·威廉斯著，〈電視：文化形式與政治〉，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是如此形容的)教育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以致他對香港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生活有些看法。至於公共廣播，在內地生活的四十多年中，他沒有收看過電視，只有看電影(以官方電影為主)。比較之下，他認為小說和報章宣傳對他影響最大，而共產官方所塑造的英雄烈士雷鋒亦是其學習對象之一。電視影像是來港後才接觸到，我問他在突如其來，到處可見電視影像充斥下有甚麼反應，

他說：「初時(住板間房)在二房東啲細路睇電視時都會睇一眼，覺得好似有顏色既圖畫。我感覺到「麻麻咗」，無乜意思。」

我問：「點解？」

呂老師答(以下簡稱「呂」)：「點解呀？因為我感覺到我的思想水平比佢咁高啲，我不喜歡睇呢啲電視…尤其是香港亂「UP」嘢個啲(節目)。」

我問：「邊啲亂「UP」呀？」

呂答：「(譬如說)周星馳囉、曾志偉囉、肥肥(沈殿霞)囉！全部無價值，又無幽默感，人生的目的胡里胡塗，佢(地)人生無目的！講老實話，我好睇唔起呢啲人。其實在我應該睇得起佢(肥肥)，肥肥就是我哋上海人，但佢嘅一生我覺得好慘。佢倚靠呢種方式(在胡鬧節目中扮小丑)來博取你地嘅好感，年紀好大都要似隻馬騮仔一樣，有咁嘅必要咩？所以我唔鍾意呢啲電視(節目)。」

我問：「有無睇過歡樂今宵？」

呂語氣加重答：「胡鬧劇嚟嘅！一啲好有錢嘅人，食飽咗想消化吓，想哈哈笑吓睇嘅。香港人最鍾意睇喜劇(這裏指胡鬧節目)。喜劇(胡鬧節目)，只係用眼睛去

睇，一瞬間就忘記咗喇，但悲劇要用思想去睇。悲劇可以一生一世都記得，呢個地方，呢個眼神點樣感動人。喜劇？」呂慨嘆地想了一會繼續說：「中國人呀，非要窮人才可理解中國的命運，香港人跟本唔理解。大家觀點(處境)唔同，無辦法放埋一齊。」老師個人對香港電視節目的看法，都以胡鬧劇娛樂觀眾的胡鬧、無價值來形容。而對話中也牽引到老師認為這也是因為中、港兩地人民的歷史文化差異，以致兩地對中國的理解深淺程度有所不同。

我繼續問：「你唔鍾意電視嘅娛樂性？」

呂答：「電視應該係一種教育工具嚟，人要不斷學習，與不斷變化的世界先唔會差距太大。香港電視(指免費電視台)做唔到呢啲，但(衛星電視)鳳凰台開始做到，除此之外，我仲有其他嘅補充：我睇(衛視)法國電視台 TV Five。佢(TV Five)有佢自己嘅觀點...有講政治又有講娛樂方面嘅。講娛樂方面，呢啲香港電視台差好遠。佢(TV five)講嘅喺最靚嘅衣服，最特殊嘅化粧技術，最大膽嘅演出，你香港啲根本唔夠膽演呢啲，所有 model 差不多全部三點都露，有乜出奇啫！」回憶是非常跳躍的，它常常在說話當中遊走於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譬如談到電視娛樂性時，老師會說到 TV Five 中有女性的裸體演出時，話題一轉會談到他的過去經歷，就是女性的身體與他在中國大陸時當的專業的關係。「做我哋婦產科醫生...咪就係呢三點地方轉嚟轉去囉！」佢(香港商業電視台)講唔到嘢，呢三點其實包括好大，好多嘢，佢只是去到呢三點啱啱開始嘅呢樣嘢。所以有時候會覺得(現代女人)好可憐，我係婦產科醫生，我好同情佢地，可惜我無辦法。」

我問：「同情邊個？」

呂答：「同情有三點嘅女人。」話題又不知不覺地去到他如何看現今女性身體上：

「而家啲女人為咗隆胸呀，咁淒涼，乳房一定要大嘅咩？乳房唔駛咁大嘞，係咁樣(保持現狀) 啱啱好呀，唔駛廷出嚟嘞。(好多)女人而家當自己係商品出賣呀？！好多女人都係咁樣博取男人(歡心)，為咗男人而生活，為咗呢件「貨(女人)」可以喺櫥窗好睇啲去隆胸。兩點好似露，好似唔露，露咗咁又點啫？(露胸不露點)跟本就全部露出嚟啦…呢啲係一種「方式」嚟，無意思！…所以無必要攞到咁淒涼嗎！有乜咁神秘？無意思。」老師覺得很多人都會被這些把戲迷惑了，其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教育上，也是他的老本行。他說：「所以我認為挽救人性最後的辦法係廣泛嘅教育…做一個人起碼要知道兩樣嘢：一個係哲學，一個係當半個醫生：要完全明白器官點樣應用。」而對於失控的性器官引起的罪行與社會道德問題，老師又從絕對醫學對純粹人體生理與功用的方法解決。

呂繼續：「乜嘢叫 **SEXY** 啫？雄性動物就係咁(比較容易受雌性身體吸引而產生性慾)。」若果性器官的功能與性慾問題弄不清便會引起社會上強姦這類罪行，傷害了其他人。對於解決的方法也是功能性的，他說：「強姦犯最好的治療方法是 CUT 咗佢(陽具)。」接著老師對不同時代社會上的上流階層都一樣會以身份地位把他認為不道德的關係理所當然地合理化(naturalization)也看不過眼，而他的說法也是很官能化的：「(例如香港的名人富豪)何鴻燊有咁多老婆，佢「用」得咁多咩？中國人有錢就好似以前啲皇帝咁攞好多女人，何必呢！」

我再嘗試把話題帶回到電視節目上，於是我再問：「香港電視(指免費電視台)嘅午間節目有很多長者會收看睇，都會講吓有關保健方法，您有無睇？」

呂答：「同我講保健？我跟本唔聽佢，呢啲醫生亂 UP，呢啲醫生通通唔係好人嚟。」

他再次由談到節目中講授保健的醫學常識，牽引到醫生個人的專業道德操守上：

「假如你係婦產科醫生，點會對每一個第一次生 BB 嘅講你第一次生仔好痛，我睇你都係開刀分娩吧喇。」香港事實有不少的婦產科醫生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這樣建議「客人」剖腹分娩。呂有點激動，繼續說：「點可以咁樣做！我做婦產科醫生時從來無咁樣！產婦最好可以自然分娩，唔到最後都唔會同佢(產婦)開刀！佢哋(欠道德的醫生)咁樣，係搵錢搵得多：要比手術費，又要覆診，但有無良心！全部都為咗搵錢，所以好多人想做醫生，但用乜手段又係另一回事。」

對口述歷史方法的反思

小歷史vs大歷史 (history vs History)

「歷史是由個人的經歷組成的，但是個人在其中常常成為被犧牲的棋子。人民創造歷史，那是政治家門說的，如果我們在那些經歷了共同命運的人群中，看看他們真實的生活，就會為個人的無力而悲哀。歷史與大多數的人有甚麼關係？輝煌的永遠是帝王將相，而百姓的辛酸早早就被深埋在土里……」

王林，《認識黑明，認識一種影像》³

傳統的大寫歷史(History)都是由政治掌權者或專家所書寫，內容都是大是大非的

³陳小波編，《黑明與 1000 人對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1 頁中王林為攝影家黑明寫了一篇文名為《認識黑明，認識一種影像》，提到黑明以拍攝不同的中國人作為中國歷史的一種紀實方式的重要性。

「歷史事實」，如：說到鴉片戰爭往往是被侵略的論述。官方宣傳的九七回歸便是香港歷史上最美好的光榮時刻。歷史是人生活的經驗和記憶，這種以普同性(universal)當作全面的歷史觀，對社會結構面中，一般人的個人情境(包括意識)的生命表達卻是真空的。全面的歷史根本無法被完全呈現，也不可能是因果關係下的全面，但要全面地了解歷史則需更多的片面的了解它。而由人生活經驗編織出的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當中包括很多知識生產中心外圍不能發聲(hidden voices)的底層社羣(subaltern)，例如長者或外地傭工，便處於較邊緣位置，而口述歷史的方式便能透過**重新的書寫從底層來的聲音(history from below)**替他們的論述作出見證，也對抗官方的菁英歷史觀點。⁴

主體向主體(subject to subject)對話

人的記憶從腦中抽取再由口述出來往往零碎，所以我預先定好問題，希望得到較有系統的紀錄。很多問題都圍繞電視與歷史事件的關係，例如：你覺得在場於電視機內的六四事件嗎？而老師的反應卻非我想像般的大。反而我本來想問而不敢開口問的：對性和性的禁忌(他是婦產科醫生，所以我想知道會否與一般人對性的看法不同)卻是由被訪者首先說出。我因著自我(self)盛載着個人的文化身份背景而作出前設的提問。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也有其個人身份與立場，**主體性(subjectivity)未在被引導下作答而消失**，他所關心的事情仍會說出，訪者與被訪者均保持了主體與另一主體的關係(subject to subject)。事物往往存在辨証關係

⁴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麥田出版社，2003年，250頁。

(dialectical linkage)，有其正面也必有其反面，口述歷史的方法也不例外。

客觀的意願=客觀的結果

老師想憶述的，未必與主題有關，而在挑選(select) 材料作書寫時，部份紀錄會被刪去。例如：在談話中，老師曾多次間接提到中國家庭觀念的重要和他對中國的關心，但我卻選了對電視有關的娛樂、性別、道德的觀點來書寫。問題在於我的書寫不能等同於個人口述的紀錄，是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紀錄巨細無遺寫下。

因意識到自身處於論述的權力中，故很希望書寫出「原汁原味」的口述歷史。但是，*我雖有這客觀的意願，卻不可能呈現客觀的結果。我在介入書寫時，同時已注入我個人主觀對受訪者的看法，原來絕對的客觀性並不存在。讀者只可從我的角度去看呂老師部份的生命經驗。*

再現的權力：他者？「他者」？(others or Others?)

雖則如此，我覺得作為知識生產者，在此替「歷史」以外沒有被真正紀錄的底層發聲(speak for)時必須意識到再現的權力問題。再現(representation)其實包括了兩個不同的意思：在美學上是透過符號的製造去代替，模仿以再現(re-present)真實。另一意思則在政治上的代表(representative)，以小數人選代表(standing for)整個組別的人發言。⁵整個組別的意見未必一致，而代表往往只站於某一方的意見，也有可能依自己的意願偏向某方面發言。*即是，代表在權力中心只可代表組別內*

⁵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麥田出版社，2003 年，230-1 頁

某部份人，不是全部，發言者其實擁有某程度上的霸權。我對此應常有警覺性，否則在生產知識下很容易服務於權力而把書寫他人(others)的口述歷史變成由我一手塑造的「他者(Other)」的口述歷史。